

都市漂泊者的乡村物语

——聂茂早期散文的主体精神及其价值认同

章罗生

(湖南大学 文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2)

[摘要] 聂茂早期散文作品, 主要以故乡作为聚焦对象, 以童年生活和成长经历为线索, 抒写自己对故乡和父老乡亲的怀念与挚爱, 手法大都以记叙为主, 也夹杂着少量的议论和抒情。在他的作品中, 既有对农民勤劳、善良、坚忍不拔的传统美德的肯定, 又有对农民愚昧、落后的国民劣根性的批判; 既有对他们不幸命运的深切同情, 又有对改变他们命运的真诚渴望; 既有对养育自己成长的父老乡亲的感激, 又有对他们远离现代文明、封闭心灵的遗憾。作为乡村边缘人和都市漂泊者, 聂茂散文的主体精神和价值认同仍旧是给予他智慧和生命的父老乡亲以及滋润他健康成长的乡村厚土。

[关键词] 聂茂; 乡村物语; 主体精神; 价值认同

[中图分类号] I207.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3)06-0011-05

Rural Stories of Urban Wanderers

——Subject Spirit and Value Identity of Nie Mao's Early Prose

ZHANG Luosheng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Abstract: Nie Mao's early prose mainly focused on hometown, taking childhood life and growth experiences as the main writing clue. They expressed his miss and love of hometown and the people there, and its techniques are mostly narrative, with some arguments and lyrics. In his works, farmers' traditional virtues of diligence, kindness, firm and indomitable spirit are affirmed and their ignorance and backwardness are criticized. He deeply sympathized their misfortunes, sincerely hopes to change their fate. He is grateful to the hometown people who have raised him, and also feels regretful for their closed mind and being far from modern civilization. As a rural marginal man and urban wanderer, the subject spirit and value identity of Nie Mao's prose still fall on his hometown people and land.

Key words: Nie Mao; rural story; subject spirit; value identity

中国新时期的文学创作, 浪潮迭起, 流派纷呈, 其辉煌成就与勃勃生机举世瞩目。继上个世纪 80 年代的小说和报告文学热潮后, 中国文坛又不时掀起一阵阵纪实文学和散文热。而在散文创作热中,

湖南的作家是一支重要的生力军, 李元洛、梅实、刘鸿伏、叶梦、谢宗玉等中青年作家, 均以其各自的力作而饮誉文坛, 然而, 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重新崛起的文学湘军, 聂茂的散文创作尤其值得关注。

聂茂的文学创作始于上个世纪 80 年代, 到上个世纪 90 年代时已有上 10 年的创作历史, 且已出

收稿日期: 2013-05-28

作者简介: 章罗生(1954-), 男, 湖南湘潭人, 湖南大学教授, 博士,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版了诗集、小说和纪实文学等著作多种。特别是他90年代的散文创作,数量虽不多,影响却较大。在聂茂50多篇散文创作中,在《人民文学》等国家级权威刊物发表的就将近一半,其中有20多篇被《读者》《青年文摘》和《散文选刊》转载,获得过《人民文学》优秀散文奖和湖南省青年文学奖,等等。

通读聂茂的散文作品,以其题材和手法来说,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以故乡为对象,以童年生活和成长经历为线索,抒写自己对故乡和父老乡亲的怀念与挚爱,其手法以记叙为主。这类散文占绝大多数,其中可以《九重水稻》《保卫水稻》和《农事》等为代表。二是以议论为主的哲理抒情散文,如《秋日的天空》《永古的石头》和《没有屋顶的房子》等。贾平凹在刘鸿伏散文集《绝妙一生·序》中指出:“他的《父亲》一派苍凉,凡读过的人都感动。这样的亲情涌动的博大与仁慈”。的确,在刘鸿伏的散文中,有一部分是写他的家乡与父老乡亲的,其中无不渗透着他对着养育他成长的土地的无限深情。

或许都是从贫穷的山村走向都市的缘故,聂茂的散文与刘鸿伏的很相似,也是“一派苍凉”和厚重,也涌动着对农村父老乡亲的“博大与仁慈”。而且,由于聂茂的经历更为坎坷,成才的道路更为曲折,因而他的散文更执着于土地和人生,更饱蕴着血泪与深情。在他的笔下,既有对农民勤劳、善良、坚忍不拔的传统美德的肯定,又有对农民愚昧、落后的国民劣根性的批判,既有对他们不幸命运的深切同情,又有对改变他们的命运的真诚渴望;既有对养育自己成长的父老乡亲的感激,又有对他们远离现代文明、封闭心灵的遗憾。而这种爱恨交加的复杂感情又主要是通过父亲、母亲、哥哥、姐姐与自己等形象,尤其是通过“水稻”“土地”与“父亲”“母亲”的形象来表现的。在《九重水稻》《保卫水稻》与《农事》等“水稻”系列中,作者既写出了农民对土地的虔诚与热爱,又写出了他们生存的艰难与困窘。作品写到,水稻从种植到收获的全过程,是农民用“血汗写就的劳动史”,“是农民辛酸的缩影,爷爷和父亲的缩影”。当水稻还是种子时,母亲抚摸它,“像抚摸即将出嫁的女儿”,其浓情厚意可见

一斑;水稻拔节时,父亲躺在田埂上,“极惬意的样子”,听它“十分悦耳”的声音,是劳累之后期盼丰收的享受。而爷爷竟然会为自己不能再插秧了而偷流泪,临死前还要父亲捧来一把稻子,“机械地抚摸两下”才闭上了眼睛,这看似一个生活细节,其实已经上升到文化仪式的高度。接着,聂茂用一个又一个生动的细节触目惊心心地展示了亲人们“靠天吃饭”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酸图景:天旱的时候,母亲“疯了似的在田边徘徊”,“急得蓬头垢面”;为了争水,人们“饿狼似般窜到井边”,“扁担对扁担,头破血流”,致使70高龄的“五保户”老人掉井身亡;杀虫时,哥中毒昏倒,苏醒后继续拖着虚弱的身子喷农药;快收割时,夜晚全家出动赶耗子,哥的脸变得像“一块干牛粪”后又不幸被电打死;收割时,母亲带病坚持,晕倒田中……透过这一系列的原生态叙事,聂茂想要表达的就是,对于农民来说,“每一粒水稻都是一个可触摸的希望,是拜下去就不再起来的肉体,是痉挛不已的魂”。也因此,“我”既懂得劳动的痛苦,又懂得面对水稻常常产生而对父亲的感觉,而这样的感情只有跟农民有血肉联系的人才会产生,这样的文字,也只有挚爱农民的作家才能写出。正如艾青所吟咏的:“为什么我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而正是作者这种深沉的情感与悲凉的文字中,我们才深刻认识了中国的农村与农民,才深刻地感觉到了文学的现实主义力量。它使我们看到,中国农民肩负着多么沉重的生命重荷,他们的生存多么艰难,他们距现代文明多么遥远。这是一种来自生活底层的、撼人心魄的的真实。它既非以往“政治+诗意”的散文可比,也与吟花弄月的闲适小品迥然相异,其精神血脉更多地与鲁迅、艾青、赵树理等前辈作家的灵魂相通。

二

郁达夫认为,“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五六年前的回顾》)。意思是说,文学作品一般都写作家自己所经历、所熟悉的生活,都渗透着作家自己的真情实感。这句话实际是对王国维“有我之境”的注解。相对于“无我之境”与金庸等

作家而言，郁达夫这一观点也许不够准确、全面。但他强调文学必须写真人生、真感情，这却抓住了问题的根本。因为“真”是与“善”和“美”联在一起的，尤其对于散文来说，这一点更为重要。如巴金的《随想录》就是因说真话、抒真情而为读者所看重的，而聂茂散文的魅力和价值首先也在于此。他不仅写真事、抒真情，而且写真人生；不仅写自己的父母和家庭，而且写自己人生经历和奋斗、追求。他的家庭和人生本身就有很强的典型性，我们也就从中读懂了社会、历史和人生。如在《父亲》《母亲》《农家的孩子》和《曾经有过的日子》中，我们从父子情，母子爱以及“我”与姐姐的童年生活中，分明感受到了农村的贫困、生活的艰难与人生的困窘。在《为童养媳的母亲》中，我们从作者对母亲不幸遭遇的深深同情中，分明看到了中国劳动妇女所受的封建压迫和精神奴役；而在《故乡泪》中，我们在感觉作者博大的人道主义胸怀的同时，也深切感到了社会问题之严重。当然，在《我记得，我感动，我爱》和《忘不了，那布满天空的爱恨》中，更认识了当代青年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和体会到了“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的人生哲理。作者出身贫寒，生性忠厚，且勤奋好学，立志高远。但命运之神却并未青睐他：梦想当作家的高考后却被录入一所卫校，毕业后又被分至乡村医院。然而，秉承了中国农民刻苦耐劳品性的他，并未屈从命运的安排，他含辛茹苦，顽强拼搏，终于以汗水和青春换取了文学硕士学位和诗集、小说的出版，更不用说后来毅然出国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和教授资格所付出的辛劳。正因为他有这样的阅历，他对生活才如此真诚，对人生才如此执着，对爱情与事业才如此珍惜。读他的《秋日的天空》，我们不能不被他的深沉情感和深邃哲理所折服：

每一天都可能是一生中最后一天，所以，你要努力做好任何一件事，包括小事，让这一天完完整整的属于自己，平和、充实、愉快。

一个孤独的地方，常常是获得痛苦和赢得荣誉的地方。寂寞的背后有两条路，往前是鲜花和掌声，再往前则是更深更重的寂寞；往后至是沼泽，沼泽上面往往铺有美丽的陷阱和短命的苔藓。你往何

处去？……

想想这就是最后一天内外会觉得崇高、宁静，像秋日的天空。你写下的文字就是绝笔，你说出的话说是遗言，你迈出的步伐就是抉择。因此，你不能乱涂乱画，要珍爱你面前圣洁的稿纸；你不以搬弄是非，要呵护你苦心经营的荣誉；你不能走上歧途，要捍卫你矢志追求的光明。

……征服感情是极其崇高的事情，往何逢场作戏和诸如此类的杂念都将亵辱这个圣洁的字眼：爱。爱意味着光明、欢乐和奉献。为爱而活是伟大的；为爱而死是高尚的。

文如其人，言为心声，这些话，实际是他的人生总结和宣言。从这里，我们触摸到了一颗赤诚滚烫的心！从这里，我们也可看到，聂茂散文，联想丰富，议论精辟，寓意深刻，如同散文诗。除《秋日的天空》外，他的《永古的石头》将石头，历史与“我”相联系，从中探寻人生真谛；《没有屋顶的房子》也托物言志，寓指自己经过奋斗，经于获得了自己、独立；等等。由此可见，聂茂散文是有着多种手法与多样风格的。他既能将感情深藏于文学之后，冷静叙述，也能将思想驰骋于天地之间，热烈抒情。阅读聂茂的散文，我们强烈地感觉到，他的文本亦情亦理，意满气足，出手不凡——正如贾平凹说刘鸿伏：“人一旦养了大气，必有利器在手，大刀长矛可以杀人，扇子筷子也能杀人。”^[1]聂茂的散文已经具备了这种力量，这是文学的力量，更是作家心灵的力量。

三

在新生代散文日益受人们关注的当下，散文更接近其本体意义上的价值多元化。尽管这类作家的创作从总体上说“功绩大于实绩”（楼肇明语），但当一批又一批衣着简朴、面带愁容、说着变调的普通话或永远改不了乡音土语的耕耘者在经历令人动容的艰难拼搏后步履沉重地来到都市，他们在接纳——拒绝——融入——再拒绝的反复尝试后，终于用握过镰刀锄头的手握起笨拙的笔，真实而质朴地倾诉自己的内心感受时，散文便有了另一种境界，有了灵性的闪动、泥土的芬芳和扑面而来的俚

语民俗。无疑,聂茂对此有着深刻的体验。这位土生土长、浸淫湘水楚雨的农家子弟在沐浴遍地巫风、感受神秘和不可知的大自然的种种奇异后,把自己的追问与审视、叛离与融入、皈依与抗争形成文字,深深植根于故土的血脉和都市的烟囱中。

读聂茂那一系列厚重凝炼的乡村散文,我的强烈感觉是:这是乡村边缘人和都市漂泊者在黄昏的屋檐下自言自语。他来到了城里,但他的根仍然在农村。他回到了农村,但他又感到,那已经不是他生活过的农村。他无法真正融入农村或城市的任何一方,成了生活的悬浮者。因此,他时而焦灼不安,渴望与慷慨激昂,时而宁静如水。其主体精神是自傲与自卑交织、渴望与惧怕交融、自我拯救与自我放逐合二为一。一方面,他怀着欣喜的心情赞扬和拥抱都市里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但这种“赞扬和拥抱”随着骨子里审美心态的改变而很被放弃。

换言之,审美主体无法与貌似清高、实则粗鄙的客体达到价值的认同,聂茂念念不忘的仍是给予他智慧和生命的父老乡亲以及滋润他健康成长的《九重水稻》,他满怀深情地写道:“每一棵水稻都是一个可触摸的希望,是拜下去就不再起来的肉体,是痉挛不已的魂。它朴素的叶、挺拔的茎、饱满的籽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这里有象征和隐语,有痛楚和呼声,有幻想、希冀和对故土挥之不去的情愫!正因为此,“终有一天,我仍会从走进城市的路上回归故里。”(《故乡的路》)另一方面,故乡的茅棚和草垛、愚昧和屈辱又是那样的触目惊心,文明的代价真实而惨重:“一栋栋新砌的红砖瓦房空荡荡的,田里的野草已长出老深,屋后的山上光秃秃的,一律的老人,一律的小孩,咳嗽、啼器穿过乡村的心。”(《故乡泪》)这是作家朝思梦想的故乡吗?沈从文说,美是令人心疼的。面对古老的土地被零乱地翻耕,面对挂苔的篱笆被盲目地拆除,作家在乡村古韵尽失、新风未建的夹缝中感到痛心和无所适从。他在强烈的失落后痛切地写道:“我在遥远的地方仍能触摸湿漉漉的泪水,故乡的泪水比雨更多。”正如有些评论家指出的那样:“故土乡亲已不再是人生避难的风雨茅庐,而是促使地奋斗不息的

精神支柱与力量源泉。”^[2]聂茂成了精神上的边缘人,一种被遗弃(并非被动)的孤独感充溢他心中。这就注定他散文风格的多变和审美主体的自我放逐与自我拯救。

作为都市和乡村的边缘人,聂茂能以较好的创作心态和适宜的审美距离来观照时空变化所带来的心灵震撼。对都市,聂茂既陌生又熟悉,经历人生打磨和深深思索后,他已“不再嘲笑城里的孩子不知道大米从何而来,”因为他“已经是一个城里人”(《九重水稻》)。但事实上,这不过是一种不屑情愿的自恋行为。短暂的陶醉无法改变生活的苍白。当他试图以“城里人”的身份投身于喧嚣的街市、流行音乐和变幻莫测的霓虹灯时,他很快因“水土不服”而产生“局外人”的感觉。他总是想起《农家的孩子》是怎样艰难地《走过风和雨》。然而,面对既熟悉又陌生的故土,聂茂意识到,“与其住在父亲苦心经营的土屋里,不如住在天空下。”他说,他“一直在逃避父亲”,“担心自己背叛了他”(《没有屋顶的房子》)。这里,聂茂明显感到自己与故土的距离,与父老乡亲由于学识、观念和审美认识的不同而产生的隔阂。从文学与自我、文学与人类基本生存方式的关系看,聂茂的认识体现了作家主体和积极性。他不想欺骗自己,不想因故土养了自己而包容他的愚昧与过失,不想为故乡的封闭、落后、贫穷唱一首灰色的赞歌。因为,“感恩图报必然导致作家主体精神的软弱与社会透视的短浅。”^[2]

四

很多时候,聂茂的散文总能勾起我对他外形的想象,在炎炎烈日下,在沸腾的稻田里,少年时代的聂茂是怎样深刻地体验到劳动(生存)的艰难啊!当他终于有幸读到那首著名的悯农诗“锄禾日当午……”时,他竟不堪卒读,深深地哭了。窥一斑而知全豹。聂茂将多愁善感与发愤努力紧紧连在了一起。他成功地走出了结满愁怨的乡村,来到浮躁繁华的都市。此时的聂茂早已少年老成。他原以为向往已久的都市会成为他精神的憩园、灵魂的驻地,但他立即意识到命定的根依然无法从钢筋水泥的地板上扎进去,依然飘泊在疲惫的精神之旅。有

一次,聂茂被请去豪华的宾馆吃饭,他很自然地把宾馆发给顾客用以抹嘴、挡羹汁的布巾叠好放进口袋。出得门来,忽觉有人用异常的目光看他,才发现大伙把布巾留在桌上。他顿觉惭愧:“这人生的盛宴,我却不知哪些该留下,哪些该带走?更令我惭愧的是,在人人吃得撑饱、剩下许多菜羹的情况下,我竟饿着肚子回家!”(《盛宴一巾》)这是生存境况在水油状态下的生动体现,尴尬而滑稽。在聂茂的骨子里,城市是别人的,盛宴是别人的,这里的一切秩序他都不懂,这里的所有规则他都陌生。他茫然、困惑、急促不安……聂茂总是这样毫无遮掩地将自己的痛苦和敏锐的体验披露给读者。

聂茂的散文令人联系到他一副紧锁眉头、悲天悯人的模样,直到收到他寄来的散文集《天在悠悠》,从插页照片上我发觉自己犯了经验性的错误。聂茂很坦然,很明朗,伏案疾书,一脸的宁静。在这本散文集里,我对聂茂有了更深的了解,对他的“漂泊”(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指称)和“忙迫”也有了更多的认识,从而,对他散文中所表现出的独立人格和放逐精神有了更广泛的认同。这种认同突出表现在他近期散文中。他写石头,写大水,写乡村牧歌和哲学之岸,往往写得诗意横生,较之以往空灵多了,文字的弹性和张力也大得多了。每一句话都蕴含丰富的象征,每一个词都是反复选择的结果。如果说,“水稻”系列及其相关的乡土散文标志聂茂写实风格的确立,那么,聂茂随后的散文则反映了作家思维的飞跃、视角的嬗变和传统价值的解构。“有谁深刻地审视了石头暗藏的种种玄机?有谁被这些玄机一一击败,又把希望寄托在更玄的仪式上?有谁被这些仪式撞得头破血流而仍然痴恋于它?”(《永古的石头》)这振耳发聩、深入事物内核

的发问触及了人类的灵魂,浸润着浓厚的主观情绪和审美倾向性。在这篇充满灵气和哲学玄思的散文中,我们可以窥视聂茂那颗敏感而躁乱的心,他在远离乡村和流浪都市的过程中深刻感受到文字和语言的双重压力。这里的文字飘逸而充沛,这里的语言带有强烈的诗化和思辩色彩,是浓缩了的、从普遍意义上提炼出来的自救的回音,与乡村俚语相去甚远。诚如评论家吴亮所指出的那样:“他的语言慢慢地失去了公共的性质,仅成为个人独自或少数人之间的通讯密码;他的创作慢慢地失去社会交流和谋求公认的功能及意图,仅成为个人想象力的映照和少数人之间的传阅品;他的自我认识慢慢地失去了对人类一般认识的含义,仅成为个人反省或少数人彼此理解与默契的一个倾诉。”^[3]这种“小众文化”式的创作诉求显然不是聂茂所追求的。从海外归来的聂茂依旧保持着农家孩子的本色,他从早期的固执和偏狭中走了出来,在乡村和都市的中介点上作瞬间的停留,他无意留恋某一处陈旧的风光,他的心告诉他,前面的烛光永远在诱惑他。他会孤独地走下去,朝向新的更宽阔的境界!

参考文献:

- [1] 刘鸿伏. 绝妙人生·序[M].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4:3.
- [2] 谭桂林. 都市心灵的自我拯救[J]. 当代作家评论, 1997(5):75-80.
- [3] 吴亮. 与陌生人同在[M].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2011:67.

责任编辑:黄声波